

■新作聚焦

祝勇长篇小说《国宝》：

文物远征 精神崛起

□邱振刚

当雪越下越大,把古都北平笼罩在一层雪幕中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书记员那文松走出了大方家胡同的家门,走进故宫东华门,踏上押运故宫文物南迁的旅程。

这是祝勇长篇小说《国宝》的开头,弥散于文字中的沉郁气息,既来自北平深冬的严寒气候,更来自当时艰难的国势。从此他的命运,他一家人的命运,就和13000多箱故宫文物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一天是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1933年2月16日。那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日军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尤其是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沦陷后,平津一带形势日益危急。故宫文物是侵略者所觊觎的对象,已经危在旦夕。故宫方面决定申请南迁,并在争议声中获准。《国宝》这部作品所重现的,就是故宫文物南迁的浩大工程。13000多箱国宝的万里跋涉,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史诗远征,由此在这部作品的叙事版图上展开。

文物迁徙与家人离散：主副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

《国宝》的六卷文字中,主线自然是故宫文物的迁移过程,另一条副线则是那文松一家人辗转漂泊、由分别到团聚的过程,这两条线索被放置于全民抗战的历史背景中,辐射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的杀戮暴行、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溃败、国民党官场中的腐败丑行,以及北平、南京、成都、西安、潼关、安顺等地的民风民俗等信息。这些信息既是时代背景,又是叙事要素。《国宝》所采用的移位换景的叙事策略,使得文物迁移路线转化为观察战时中国的移动视窗,在辗转万里的轨迹中展开一幅容纳了众多历史场景的长卷。

小说的故事主线中,故宫文物的安危是叙事张力的枢纽。主人公那文松是从沦陷后的沈阳一路漂泊来到北平的。他凭借书画鉴定本领在北平立足,还进入了故宫,有了温暖的家庭。而当他走出妻子梅遇影的视线,来到正在进行文物装箱准备南迁的太和殿广场,他的身份由辨伪存真的书画鉴定者变为身系重任的文物守护人。文物南迁前,那文松的日常生活是文人化的,他一直活在古书画的褶皱间,松弛、写意。他能在《松柏寒盟图》题跋的“飞白”里辨认出真伪之间极细微的差异,这样的鉴定才能足以让在北平古玩行业混了半辈子的岳父梅从云汗颜。但是,当日寇铁蹄日益逼近千年古都北平,意识到自己毕生钻研的古人笔墨不再是案头雅玩,而是承载着千年文脉的密码,最终肩负起押运文物南迁的责任。为了保护文物,他身上知识分子的柔弱在战火中淬炼成钢。他和文物时聚时散,最终辗转十多个省份,和同事在战乱中步行穿过半个中国,守护文物直到抗战胜利。在小说中,文物专列的滚滚车轮,他守护文物的身影,成为穿缀一幕幕危急场景的网线。

作者深知调整故事呼吸节奏的重要,在扣人心弦的文物迁移过程中植入了精密的专业知识叙事。这部作品集纳了数十次文物鉴定过程,这类情节不仅仅增加了阅读趣味,更成为故事发展的推进装置。就前者而言,小说中对书画真迹鉴定方法、对“钩摹响拓”书画复制技术的介绍,都扩充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知识容量。小说中那文松曾经在古玩店、监狱长办公室等场景中看穿了对赵孟頫《松柏寒盟图》足以乱真的仿造。虽然那文松鉴定的是同一幅古画的多个摹本,但作者的叙述过程各有不同,各有各的生动之处,这也为那文松后来识破国民党高官和书画造假集团的勾结埋下了伏笔。

在《国宝》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中,另一条线索则是那文松家人的命运。那文松离京押运文物后,一家人因为他的迟迟未归而归而忧,又因为他银铛入狱的消息而惊惧。日军占据北平后,为了压榨北平人民的反抗意志,实行了残酷的经济政策,全城因此陷入饥饿之中。那文松的岳母萧桂花,在外出买粮时被抓进日军拘留所里,她为了免遭凌辱撞墙而死。岳父梅从云用《昭君出塞图》只能换来十个鸡蛋,浩劫当前他不减民族气节,发誓不和侵略者合作,最后点燃满屋明式家具自焚而死。在这里,古书画、古器物等文物,都在侵略者的枪口下由文明的载体异化为生存的工具。作者用文物与食物的反向关联表现了

■评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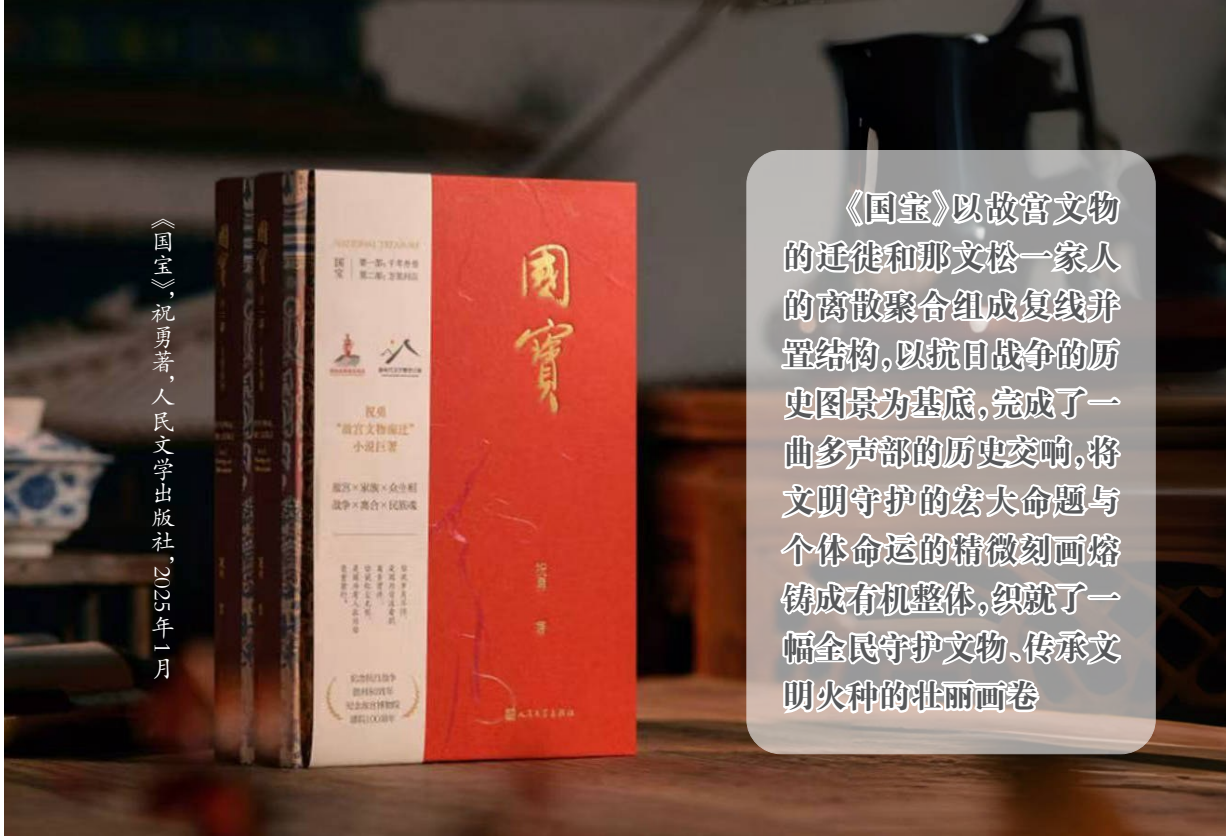
在源头看见所有生命

——评马文秀诗集《三江源记》

□朱必松

马文秀从《雪域回声》《老街口》《照进彼此》再到《三江源记》,一路走来,正像从高原走出的一条河流,在大江大海里交汇。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深邃的哲理性思考、漂泊中的神性语言、丰沛的文化自信,都显示出作者卓尔不群的民族气质。诗集《三江源记》分为《走向高地》《灵性之光》《高原守望者》三辑,共计139首,显示了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对长江、黄河和澜沧江这三条发源于诗人三江源家乡的,被誉为“中华水塔”的所在地河流的深情礼赞。三江源地区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许多珍稀野生动物,如藏羚羊、雪豹等。三江源地区对于维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江源记》是诗人关于自然与民族题材的诗意表达。诗人用行走丈量着那块有奇迹的土地,“唐朝的岩画/留在通天河的波涛/无数探秘者穿过澜沧江流域/只为一睹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进藏的盛况”(《崖石上的史书》)。诗人的游历执着于“对源头的探寻”,执着于对普通人和所



战争对文明的摧残。

呈现“国家一文物”命运的同构性

旨在真实重现文物迁移过程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的互文性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与之不同的是,《国宝》针对那文松家人的命运,增加了大量虚构性内容。在《国宝》中,那文松家人的遭遇是卢卡奇所说的“创造性回忆”,这部分内容既是对侵略者铁蹄下普通百姓共同的悲惨遭遇的典型性记录,也是对故宫职工家属、北平市民这些特定身份者在战争年代里命运的展现。

无论梅遇影母子二人的凄惨遭遇,还是那文松和故宫同事们押运故宫文物的漫长旅程,都映衬着当时战事的描写。当满载文物的列车驶出北平平汉铁路火车站,车窗外的场景从正阳门城楼变成华北平原残雪遍地的田野,又渐变为大雨如注的南京浦口车站,文物专列中《竹林七贤图》里文人雅士的优雅日常、《踏歌图》中农家的丰收盛景,与车窗外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形成残酷对照。此时,文物虽然沉默不语,但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审美对象,成了连接历史记忆和战争创痛的特殊媒介,“国家一文物”命运的同构性也就得到了深刻呈现。南京城破之际,当装满文物的木箱在木排上与逃难人群并行西去,这种历史与当下时空并置的叙事策略,将文明守护与野蛮摧毁的冲突推向极致。小说中还写到,即使到了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仍有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文物的运输、保存倾尽全力,如主动请缨在日军炮火中驾驶列车驶入潼关的年轻司机、为了让故宫文物免遭大火宁可烧掉自己房屋的峨眉县百姓,作品中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实际上也构建起文明火种在民间传递的精神图谱。

和普通民众阶层守护国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贪腐高官们所制造的荒诞现实。国民党元老、高官许初梨,一手炮制了易东篱盗取文物的冤案。而高居行政院副院长之位的宋子文,看似关心文物命运,但一旦涉及现实利益,对于显而易见的冤案也退避三舍。国民党监狱长王耀濯还请那文松鉴定大批文物仿品的质量是否过关,却被看出这种系统性造假的行为不是个别官员所为,“不是一个人、一伙人,而是一部行政机器”。

小说中,先秦石鼓、《四库全书》等文物不仅是祖先馈赠的物质遗产,更是民族精神的可触化形态。那些装载文物穿越战火的箱子,最终成了装载民族文化基因的诺亚方舟,在历史的洪流中证明:只要文明的血脉不息,一个民族就永远有重生之力。小说后半部分那个全家人死于日军

狂轰滥炸的男童吴小雷,他在那文松的照料养育下渐渐成长,他的命运实际上是对上述主题的生动隐喻。在事关文明存续的宏大叙事里,每个为了国宝安危尽了一份力的普通国人都文物的临时保管员,都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奋勇抗战的精神品格是无形的‘国宝’”这一诠释增添新的精神注脚。在13000多箱文物颠沛流离的轨迹里,不仅叠映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脉络,更折射出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立体光谱,整部作品也因此笼罩着一种沉郁苍茫的史诗气质。

在《国宝》之前,祝勇已经通过《故宫文物南迁》《故宫六百年》《故宫的隐秘角落》《血朝廷》等一系列作品完成了对故宫、故宫文物、故宫历史三位一体的多维度讲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表意体系。即便如此,这部《国宝》在祝勇的故宫主题文学系统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以往的作品中,作者与讲述对象之间主、客体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作者与故宫文物、故宫历史、故宫本身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关联,但在讲述过程中仍然把这些内容充分地对象化、客体化了。而在这部作品中,故宫文物不再是静置的,它的价值因为其本身处于湮灭的风险中而受到远超平时的极大关切。此时,作者叩问历史的姿态更接近中华民族的普通一员,他将共有的民族情感投射于文物之上,作品的叙事重心由故宫里有什么、故宫里发生过什么、文物的宝贵奇妙之处是什么,转向了故宫、故宫文物、故宫的历史对国家、对民族、对读者自身意味着什么。这既是作者本人在历经多年的持续性写作后对原有叙事框架、叙事姿态的突破,也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备受关切的当下,故宫这一超级文化IP的价值、内涵不断增值、不断扩充和延伸,日益深刻地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象征物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社新闻部主任)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创作谈

2010年,在“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开启时,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说还一无所知。那时我正师从刘梦溪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没能参加这次考察活动。此后我有幸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有机会深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中。越来越多的文献、档案,包括文字和图像,带着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信息涌到我的眼前,破碎的、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时光一点点拼合起来,那段被屏蔽掉的历史,像拼图一样,越来越完整。虽然那段不寻常的历史赐给了我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但我深知,非虚构历史作品侧重于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与重构,而要表达他们内心的起伏跌宕,他们在多变的世界上的命运抉择,必须借助于一种更深刻的表达,只有文学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这群在战乱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的一生,几乎囊括了20世纪的国家命运。每当我面对他们的旧照片,都会被他们面容的平静所感动,尤其是那个在贵州安顺加入故宫博物院的黄居祥,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那份淡定,透露出他们内心的强大,强大到了我不可想象的地步。很多年中,他们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闪动,他们的命运在我的心中翻腾,搅得我心神不宁。我要潜入他们的命运轨迹,去感受他们生命的温度,触摸他们的心跳,面对他们面对过的复杂现实,从无数种不确定中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径。不知从何时起,我有了写一部小说的冲动。

我预感到《国宝》将被写成长河小说。长河不只意味着形式上的多卷本,更意味着叙述时间的大跨度和社会、历史内容的丰沛容量,犹如一条悠悠大河,河道宽广,奔腾不息。长河小说的写法和一部精致的小长篇的写作是不同的,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长篇,一般是集中在叙事上的,采用线性结构,一条道跑到黑,把一个故事有声有色、有头有尾、有序幕有高潮地讲完,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好似一个导游,引领你一路看风景,假如是一个不错的导游,的确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在我有限的视野里,还没看到过这样的小说。长河小说更复杂,更有兼容性,可以包罗人间万象(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它写的不是一条观光路线,可能是一片路线,像我当年拍摄《天山脚下》纪录片时,深切感受到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片路,在天山南北,有无数条这样的通道。横亘东西的天山山脉是天然的坐标,只要抬头能看见山影,就没有偏离方向。

故宫文物南迁还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已经发生过了,它的所有路径都无法更改了,已经变成了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被我们所了解。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正如我在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的先导片的字幕里所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写的,是这种未知感,命运的不确定感,以及纠结在这种不确定感当中的复杂人性。

故宫文物南迁还是一个闭环的历史事件,它的起点、终点,都在岁月中尘埃落定了。这决定了小说的叙事是线性的,但我不想把它写成一部封闭的小说,而是无限敞开的,把近百年历史、几代人的命运都写进去,太和殿是坐标原点,故宫文物南迁是一条线,那文松、梅遇影、梅从云、丁铁竹这些人物的悲欢苦辣、生死契阔是串在这条线上的珍珠,也是小说的灵魂。因此这部小说,主题是故宫文物南迁,容量却不止于故宫文物南迁,而是百年国运兴衰,是我们国家从屈辱到自强的抗争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主题。我力图使这部小说有更大的历史吞吐量,成为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城堡里交集、相遇,构建矛盾,进而编织起叙事的经纬。当然,在故宫文物南迁的整体叙事中,这些大历史只是背景,对这些事件的引入是碎片式的、个人化的、生活化的,在个人与时代的碰撞中,展开我对那段历史的想象。

这部小说在我心里盘桓了好几年,大约是在2019年前后,我就曾为这部小说写过一个大纲。单就大纲而言,还是蛮吸引人的,也是很严丝合缝的,然而一旦动笔,就发现这份大纲是一个紧箍咒,让我根据它的初始设计亦步亦趋,束手束脚,文本不能充分打开。所以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抛弃了这个大纲,让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脉络像大地上的植物,自由生长。故宫文物南迁的总脉络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附着在这个历史大叙事的具体人和事。真正好的小说,不是作家带着人物往前走,而是人物带着作家往前走。这样的小说,才是接地气的、自然生长的、有生命力的,而不是生硬的、主观臆造的、先入为主的。这是我写作《国宝》时一个切身的感受。假如说《国宝》有一个大纲,那大纲就是历史的真实脉络,但那只是一个模糊而粗略的轮廓,是事件发展的总轨迹,而不是每一个人物的具体生命路径。我要让我笔下的人物命运在这样历史的大轮廓下自己浮现出来,奔跑起来,哭起来笑起来。放弃了最初的大纲以后,《国宝》的写作终于大踏步地前行了。那家、梅家两家人物,还有易东篱、马横岭、石不言、吕医农这些故宫博物院同人就纷纷向我走来,带着各自的命运沉浮、各自的人生苦辣。

《国宝》的写作过程让我兴奋,我感觉自己在经历过主人公的经历,与他们一路相伴,同甘共苦。我不是正规军,充其量只是游击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没有任何负担。尽管每天伏案几个小时,每天结束写作时都几乎要瘫倒在沙发上,视疲劳一时难以恢复,从体力到心力都是极大的付出。但我觉得《国宝》的写作对我是一种锻炼,甚至是一种滋养。通过写作,我的创造力得以激发,心气得以凝聚,毅力得以培养。《国宝》的写作是一场持久战,不是歼灭战。《国宝》的写作经历让我认识到,这种60万字规模的大型作品的写作与散文不同,也与单卷本小说的写作不同,想快快不了,就像一锅老汤,只能文火慢熬,否则不是夹生,就是烧糊了。

小说跨越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处决日本战犯、国民党败退台湾、北平和平解放等诸多重大事件,当然都是作为“幕后”,隐隐地存在着,决定着人物行进的路径。出现在“台前”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是深深嵌入国家“大历史”的私人“小历史”,只不过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所谓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非常”,变得颠簸不定,险象环生、充满不确定性。的确,那些被历史事件所裹挟的生活,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那些岁月像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雕刻着他们的风骨,承载着他们的情感,虽然在狂风暴雨中,也表现得从容而坚定。